

株洲面孔



漫画/左骏

诗人厨师吴晓彬
右手炒菜
左手写诗

郭亮

稀薄的米浆倒在透有夏布的不锈钢长方盆里,用手巧劲将米浆拌匀,点上点叉烙碎,回身将盆子放入蒸柜,不过几分钟取出,米浆凝固而成的薄薄一层米皮呈晶莹透亮的成色,趁热揭出,卷成条状,细心摆放在盘中,边上是两条余热的菜心……

吴晓彬熟练地将一份粉蒸做好,端到桌前——眼前的他个头不高,工装有些不合身,挂在身上晃晃荡荡的,胸前还有几块显眼的污渍,这是他位不高的厨房工作人员的常见装扮——来株洲连续换了五六份工作后,他似乎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工作,晚班点心师傅,工资虽不高,却也足够维持这座城市的基本生活开销,更重要的是,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可供阅读写作。是的,厨师之外,吴晓彬还有另一个身份——诗人,株洲市作协会员,曾在《中国诗歌》《新诗纪事》《月夜诗刊》《文艺窗》等刊物发表诗作20余篇。

被阅读拯救的“问题少年”

说起来,吴晓彬算是典型的“问题少年”。母亲早逝,父亲常年在外打工,年近半百的爷爷奶奶根本管不了肯叛逆逆反的他,初一上完,死活读不进书,成天和镇上的一帮坏孩子混在一起,“除了打老师,什么坏事都干过”,原因自己的叔叔就是老师,对知识还残存着一份敬畏之心。

就这么胡混了两年,家里的亲戚实在看不过去,便将吴晓彬送到了父亲身边,目的自然是让他远离镇上的那帮坏孩子,可镇上的坏孩子更多,都是靠苦务工的父母出来的,父母多从事低体力劳动,根本没时间去精力管理这些正处于青春叛逆期的“问题少年”们,对吴晓彬而言,不过换了个更为广阔的胡混的天地。

一个偶然的机会,竟得没有去街上胡混的吴晓彬在父子二人租住的出租房里看到一本父亲租来的武侠小说,一下就看进去了,“特别喜欢”。继而,更多的武侠小说被吴晓彬租来,囫圇吞枣地看完,最爱的还是梁羽生,“武功是其次的,人的江湖侠义才是首要的。”

跟诗歌结缘

18岁那年,吴晓彬开始进厂打工,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五金厂,只待了4天,“每天加班到晚上11点,我吃不消那个苦,再读也没时间读书。”

心,只得埋在各种文学作品里寻求解脱之法,但也同时带来更严重的负面效应,书读得越多,越是反衬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巨大,飘忽离去的心思也就越发频繁。

受此刺激,吴晓彬勤快地将脑海里不期而至的灵感记录下来,待工余之暇,再整理分类,添枝加叶,形成一段又一段分行的词句,也自此觉得写诗作词的门径,受益匪浅,发展起来的社交新媒体,这些稚嫩且生疏的词句挂在网上,总有同道之人点赞认可,就这样一直坚持写了下来。

会写诗的厨子

2012年,吴晓彬来了株洲,这得益于此前在深圳一家电子厂认识的工友唐伟利。同吴晓彬一样,唐伟利也是个爱好读书和写作的“文艺青年”,两人在厂里很聊得来,彼此分享阅读体验和创作心得,颇有惺惺惜惜之感,唐伟利在网上交了个株洲的女朋友,追随着爱来了株洲,电话里“忽悠”吴晓彬,“这城市的环境适合我们生活”,吴晓彬便辞了电子厂的工作,一车来到株洲“讨生活”。

晓彬是“讨生活”,自然以生存为第一目标,彼时的吴晓彬并无多少存款,急需找一份工作养活自己,“看到餐饮店包吃住,就去应聘端盘子,一个月1500块。”只是,这份工作并没有持续多久就让吴晓彬弄丢了,理由有些可笑,那时他加入了一个诗歌交流群,群友说在东莞搞一次线下聚会,吴晓彬找主管请假,不批,干脆辞职走人,结果到了东莞,发现其他的群友都没有来。

这样“疯狂”且不成熟的举动直到近两年才有所好转。2015年,父亲和他商量,要在怀化老家建一栋房子,父子两人用去全部的积蓄以及数万块的债务在乡间盖起了一幢两层半的小洋楼。也因为这些债务,吴晓彬成熟了不少,东莞回来后不久,便找了家餐厅工作,“在厨房打杂,洗菜切菜,杀鱼洗鸡肠子,做了半年,一个厨师觉得我勤快,就让我炒炒菜……”

在现在工作的餐厅,吴晓彬的工作时间是下午5点到凌晨1点,餐厅生意不大好,7点过后就没多少事做,这让他有足够的闲暇时间来阅读和写作。突如其来灵感转换为手机上零碎的词句,厨房里的一条鱼,下班回家路上的一只猫,露上棚吻的情侣,风光带上跑步的人群,北去的湘江水……都被他写进了自己的诗里(部分诗作附后)。除此之外,他还热衷参加这城中各种线上线下的读书交流活动,倒是印证了当日唐伟利的“忽悠”——“这城市的环境适合我们生活”。是的,这些都是当日他在深圳无比渴求却从未实现过的“理想”!

吴晓彬
部分诗作

情侣

他们拥抱,在一张椅子上说着情话。这是一对年轻情侣,年轻得像夜里生长的植物。他们亲吻在午夜街头,忘乎所以,而身后的银行大楼像座山压过来,穿流不息的天台路是河。他们就坐在甲板上……有风吹来,男孩脱下外套放在女孩身上,在夜凉里坐成了一团温暖。而时间是溶解剂,一把刀,是一柄车开往远方。

一只猫

当它跃进光里,放下起而了被着一身黑,孤独地走在大街上抖了抖身子就洒下流线的雨。警惕地看行人,我充满了好奇,仿佛看到另一个自己被放进城市荒野,每走一步都是无声的改换,它的文字被说出,它面前是身子,它眼睛如窗,不再期待,不再期待,我们对话,努力对话,只是当我一转身,它就消失在夜色中。

晚餐记

该怎么过好生活,就像夜晚飘落的叶子该怎么落地,清炒苦瓜小炒肉,这么多年来,依然在胃里争宠。房间里长出冰棍,洗衣机空转和一瓶野花,从东红出时间熬成粥,整洁的西餐,人模人样走在街上,这些还不足以安置好身体。当妻子准备好晚餐,你知道怎么扮演一个丈夫,但不知道该怎么扮演,一棵树野里的那片叶子。

投稿邮箱:
27323849@qq.com

株洲记忆

文化的饥渴

回忆石峰区识字扫盲的岁月

西文珊

9月8日,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国际扫盲日。每到这个日子,我都会想起1992年5月28日,新闻媒体报道石峰区是我市第一个实现了“基本扫除文盲”区(县)。

50年代的石峰地区,经济落后,老百姓80%以上属于文盲或半文盲。1951年,遵照“以民教民”的方针,始在工人和农民中举办业余教育,1952年,为加速扫盲进程,省城湘开行了西南军区某军文化教员创办的“新建华速成识字班”,特别选定白石港大坳街一处祠堂,专门办了个“农民速成识字试点班”。以市扫盲办为主,说专干、老带12人组成“班委会”。1952年10月6日开始宣传动员招生,16日开学,入学男性学员22人,女性学员18人。经过半年扫盲培训,40名学员中,能认识200字以下的13人;能认识200到1000字的21人;能认识1000字以上的6人。依此考评,33人可阅读一般性通俗读物,还能写便条与通知,这些解放前的“睁眼瞎子”,刚刚得到解放,就识字懂字,情不自禁的眉开眼笑。《石峰史志》说:白石港有位叫于英的40岁妇女,原来斗大的字不认得一个,参加扫盲,学习到苦,进步飞快。一次去商店买东西,看到店门上贴的对联,张口就念了出来,高兴得手舞足蹈,逢人就夸:“我认得对联了!”街坊邻居也纷纷围着她鼓掌祝贺。

1958年大跃进浪潮中,扫盲步骤提出了“万民教、万民学、万物文字化”等等脱离实际的口号,酿成了严重的扫盲浮夸风。1961年,进行调整政策,扫盲夜校、业余学校,一律停办。“文革”十年,“读书无用论”“罢课”上,职工文化教育全被取消夜校课程,面对“红宝书”、“老三篇”,职工只能靠听笔记,能够背诵几句却不认得文字。

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石峰区工交科针对“文革”造成了文盲的后遗症,策划举办了40多人的扫盲班,美其名,称做“文化提高班”。学习地址就在区政府公共食堂,教师则由杉木桥、龙头岭、清水塘、先锋、响石小学的老师兼任。六个多月后,这批学员全部摘除了文盲帽子。

1981年,为落实国家职工教育委员会加强组织结构的指示,成立了“石峰区职工教育委员会”,白石港小学的教师唐伟利负责担任专干,唐伟利是退休的民办教师任教。主要任务是:对1968年至1980年四年制中学生中未能达到初中毕业学历水准而又已参加厂矿工作的职工进行语文、数学文化补课。先期补小学课程,后期补初中课程。1981年10月至1985年7月,开办业余班5个,脱产班4个,每班每周课程6个月。入学者339人,结业合格者321人。通过这种文化补课,为石峰区林立的百余座工厂产生技术工匠的培训和普及职工高中文化提升精英工匠的教育,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1988年,党中央、国务院、湖南省、株洲市政府专题下文要求市、县企事业单位必须深入开展扫盲。市“职教委”制订了“认识2000个汉字,能看懂通俗浅显报刊文章,能记算简单账目,能写一般应用文”的衡量标准。石峰区鉴于当时“农转非”发生的部份文盲、半文盲进入了城区的情况,随即紧锣密鼓结合人口普查开展了细致的扫盲对象摸底。

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后,石峰区总人口138992人,15-40周岁的青壮年74232人,其中,文盲、半文盲仅187人。1991年3月,石峰区政府组建了以时任副区长胡文为组长的“北区扫盲领导小组”,同时以区政府红头文件形式发出了《关于城市深入开展扫除文盲的通知》,细化了“一统二扫三提高”的扫盲攻略。

1992年5月,“株洲市扫盲领导小组”履行检查、验收,一致认可石峰区“普及小学义务教育率”实现了100%。“青壮年非文盲率”实现了99.98%。“脱盲人员巩固提高率”实现了100%,成为了本土第一个“基本扫除文盲”的区域。

株洲乡贤

毛泽东与两位茶陵籍湖南一师同学的交情

侯立新

湖南第一师范位于长沙市岳麓区,前身为南宋时期张栻创办的城南书院,1903年开始独立为湖南师范馆,1912年改为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1914年再改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1913年春至1918年夏天,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习了5个春秋。其间,茶陵人曾正邦、谭云山、谭家晋、刘德隆、谭先烈(即谭超一)等与毛泽东成为同学。在此后的岁月里,毛泽东与他们一直保持了纯真的同学情谊。

现将毛泽东与曾正邦、谭云山两个茶陵籍同学的交往情况简要介绍如下。

曾正邦,毛泽东亲笔回信的一师同学

曾正邦,马江乡人,1912年毕业于茶陵州公立高等小学,1913年考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与毛泽东为同班同学。在学校里,曾正邦与毛泽东同用一盏煤油灯夜读,同睡一张床上铺,1918年夏天,曾正邦毕业回家。毕业前夕,两人同往橘子洲,各画五张画互相留念。

毕业后,曾正邦从事教育工作。1923年,茶陵第二区创办小学,曾正邦先后在第二区各小学出任教师、校长等职。

曾正邦性情刚正不阿,不愿与世沉浮,在混乱的社会中始终洁身自好。从1933年开始,曾正邦携妻子儿女租住下东桥边教书冲的瑞山野寺寮里,种田造林,过起了五柳先生笔下的世外桃源生活。在耕种之余,曾正邦应部分学生所请,在教书冲又当起了老师。他对学生十分关爱,一切学杂费用全免,学生只需自带米粮便可来学,一些有志的贫苦学子,担着粪筐来学于此。

1958年,曾正邦在教书一待就是十七年,到1950年回茶陵旧居时,曾家人已造出山田20余亩,水塘4亩,茶桐林几亩。此外,曾正邦还写了《教书冲杂记》近万字贴在墙壁上,曾正邦离山后,将全部山田无偿交给当地农会,这片山田后来成为了下东桥边村的林场。

曾正邦一生心怀济世救民信念,并把这种信念化为生活中点滴实践,在乡间,曾正邦无私接济的农户不下十数家,还自学医术,用自己所学救死扶伤,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

1956年,周恩来总理出访印度并参观了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期间,邀请谭云山回国观光。谭云山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回国参加了建国7周年的国庆观礼,并当选为全国政协特邀委员。

这一次回国,毛泽东接见会晤了这位阔别30多年的老同学。会后,谭云山根据毛泽东的安排到全国各地参观,了解并体验了建国以后祖国各地的变化。这使谭云山深受鼓舞,提笔写下了20多篇歌颂祖国的诗作。

3年以后,谭云山再次回国观光,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与陈毅作诗酬和。后来,谭云山把这些诗歌和其它诗文集为《观光祖国诗及其他》一书出版,做为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贺礼。



谭云山,受毛泽东两次度接见的一师同学